

# 孙中山《批杨鹤龄函》时间考

陈希亮

[摘要] 《孙中山全集》共收录孙中山《批杨鹤龄函》三件,其中第一件的时间,插图中的文字说明有误,而第二件与第三件实为同一件,且所标时间均误。本文通过对杨鹤龄来函及孙中山批示内容的分析,对上述错误予以订正。

[关键词] 孙中山 杨鹤龄 信函 时间

在辛亥革命的史册上,杨鹤龄的名字是与孙中山、陈少白、尤列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。民国成立以后,作为“四大寇”之一的杨鹤龄曾两次致函孙中山求职,孙中山均作了批复。杨鹤龄的求职函和孙中山的批示,是迄今所能见到的为数不多的关于两人关系的重要资料,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,尤其是对研究孙中山的用人观和杨鹤龄该时期的内心思想大有裨益。然而关于这两封求职函及其批示的时间,各种著述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舛误,很有必要加以考订。

《孙中山全集》收录的第一件《批杨鹤龄函》,内容为:

代答:函悉。此间现尚无事可办,先生故闭户著书。倘他日时局转机,有用人之地,必不忘故人也。<sup>①</sup>

标题所注时间为1919年5月24日,无误。从插图可知,孙中山的批示是写在杨鹤龄来函的信封上的。然插图中的文字说明将时间注为1919年5月18日,显系误植,应予更正。

为便于下文考订孙中山后一批示的时间,同时也为更准确地理解孙中山批示的内涵,兹将杨鹤龄1919年5月16日的来函摘录于下:

自我公乙未举事以来,此身思为公用,望之数十年矣。此数十年中因孙党二字几于无人敢近,忍辱受谤,不知几极。弟又平素不善治生,上下无交,竟成废弃,深为可惜。今者国家多事之秋,如弟之宗旨不变,诚实可靠,若用作奔走,用作心膂,赵充国所谓无如老臣者,弟亦云然矣。公其故旧不遗,器使我乎?不胜待召之至。<sup>②</sup>

《孙中山全集》收录的第二件与第三件《批杨鹤龄函》内容完全相同,为:

真革命党,志在国家,[非]必不屑于升官发财。彼能升官发财者,悉属伪革(命)党,此又何足为怪?现无事可办,无所用于长才。<sup>③</sup>

实际上是同一件,所标时间1920年1月16日和1923年1月16日均误。定为1920年的根据是《中央党务月刊》第55期(1933年2月)孙中山批示手迹中的一行说明文字:“民国九年,总理居沪,有老友某君寓书求事,因论及若某某者一行作吏,立致钜富,诧为奇诞,总理谕以此答之。”定为1923年的根据是台北版《国父全集》第四册中的注释:“据党史会藏原件。来函日期书一月九日,十六日收到。按其内容,应在民国十二年。《国父年谱》列在民国九年,似误。因来函云‘近观大局,知己大有转机’,此与民九年一月间之情况不符也。”附杨鹤龄来函:

近观大局,知己大有转机,广东三千万同胞,日日望公解决,非复如前岁之情况矣。老夫睹此,

①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五卷,第56页。

② 陈锡祺主编《孙中山年谱长编》,中华书局1991年版,第1177页及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五卷第57页题注。又见杨效农主编:《孙中山生平史料及台报纪念特刊选集》,新华社《参考消息》编辑部第42页,转引自余齐昭著:《孙中山文史图片考释》,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9年版,第445页。惜笔者未能查阅到杨著。按:各版本标点及个别文字略有出入,读者可细察之。又,赵充国(公元前137—公元前52年),西汉大将,公元前61年,以76岁高龄,仍请领兵作战。

③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五卷第205页及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七卷第293页。按:各版本标点及校勘各异,此处据《总理批牍摄影》重新标点,并将衍字及脱字同时标出,以存其真。

大有雄心。极欲服务民国，若得追随左右，必能裨补阙漏，有所广益。始谋有我，而收效岂可无我乎？嗟乎！俟河之清，人寿几何？想我公必不便四皓永匿商山，二老长居东海也。<sup>①</sup>

《孙中山全集》将同一批件重复收录（《孙中山年谱长编》同此<sup>②</sup>），已有学者注意，有人并作了考订。<sup>③</sup>如余齐昭先生在《“四寇堂主人”杨鹤龄》一文曰：“从杨函中有‘近观大局，知己大有转机’和‘非复如前岁之情况矣’两句看，似应写于1920年，孙中山1919年5月的批杨函中有‘倘他日时局转机’句，杨此函即借用时局‘大有转机’一词，以前后函应。杨此函对前函而言，故有‘前岁’之谓。因而此函应写于前函的第二年，即1920年。再者，1921年9月，杨受聘为总统府‘顾问’，算有‘职’了，至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，广东政府自然终止，杨的‘顾问’也自然终结。再过半年的1923年，似无必要说‘始谋有我，而收效岂可无我乎？’的话，而再‘逼’孙中山给他位置了。”<sup>④</sup>余先生的思路无疑是对的，然其结论却差之远矣！笔者认为，孙中山批示的真正日期既不在民九（1920年），也不在民十二（1923年），而是在民十（1921年）。理由如次：

（一）杨函写于1月9日，此无疑义，故杨函“近观大局”中的“近”，当指截止1月9日前的一段时期。查1920至1923年的形势，符合“大有转机”这一判断的只有1921年。1918年5月孙中山离粤赴沪后，广州军政府即被桂系军阀所把持，广东亦处于桂系统治之下，这一情况至1920年初没有任何改观。1920年10月粤军光复广州，桂军退广西，11月孙中山由上海返抵广州。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，9月聘杨为“总统府顾问”，杨任此职直至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，故1922年初，杨断无写信求职之理。1922年底，孙中山“讨陈”军事虽已发动，但进展并不大，直至1923年1月9日滇桂联军攻克肇庆，陈炯明败退广州，1月16日滇桂联军克广州，陈炯明遁惠州，方可称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。杨在1923年1月9日“讨陈”胜败未卜的情况下，当不会谓“时局大有转机”。

（二）从杨函“广东三千万同胞，日日望公解决”看，杨鹤龄是以粤人的身份、站在粤人的立场上谈的粤事。而在1920年的驱桂出粤运动中，孙中山等正是以“粤人治粤”为号召的。此亦可作

1921年说的一个佐证。

（三）从杨氏前后两函以及孙中山两次批示的措词和语气看，后一函应是相对于1919的函而言。杨函中“前岁”一词，一般作“前年”解，有时也表示时序，泛指从前任何一年。此处当作前解。据此可以确定，后一函的时间为1921年。

（四）从杨鹤龄的仕履看，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，杨曾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，孙中山解职后，杨即返澳门，此后一直蛰居水坑尾无计治生，至1921年1月已近十年，故杨有“俟河之清，人寿几何？”和“四皓永匿商山，二老长居东海”<sup>⑤</sup>的感慨，杨此时为生计所迫而向孙中山求职当可理解。1921年9月杨已被孙中山聘为总统府顾问，若于1923年再求职，则诚如余齐昭先生所言，似乎有些不合时宜。更何况陈炯明叛变是孙中山一生中遭受的最大打击，作为老友杨鹤龄当会比他人更能体会孙中山的感受，断不致于此时在信中流露出埋怨之情。

综上所述，笔者认为：杨鹤龄致孙中山的第二封求职函时间是1921年1月9日，孙中山批示的时间是1921年1月16日。

[陈希亮：南京图书馆副研究员

邮编：210013]

[责任编辑：虞亚梅]

① 《孙中山年谱长编》，第1554页。又见《孙中山文史图片考释》，第445页。按：各版本个别文字有异，此处取其善者。

② 《孙中山年谱长编》在“凡例”第七条谓“凡记事有异说者，经考订后取其一说，其余在注文中酌加介绍”，然该书却将同一批示在正文中重复收录，而不是用注加以说明，此既不符合“凡例”之规定，又极易使人产生错觉。

③ 如韩信夫、姜克夫主编《中华民国大事记》第一册（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）及张磊著《孙中山评传》（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）都只取1920年一说，其中《孙中山评传》在所附“孙中山主要活动年表”中将时间误为1920年1月14日。

④ 《孙中山文史图片考释》，第450页。

⑤ 按：“俟河之清，人寿几何？”一语，最早见于《左传·襄公八年》，意为等待黄河水由浊变清，人的寿命能有多长？“四皓”指秦末的东园公、甪里先生、绮里季、夏黄公，“商山”，地名，在今陕西省商州市东南，“商山四皓”意指隐居的高士。“二老”指殷末周初的伯夷和姜子牙。“东海”指我国东方滨海地区，杨伯峻考释为“姜太公之国”，据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称姜太公为“东海上人”，《孟子·尽心》云“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，……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”。孙中山一贯主张，用人要量才录用，不私故人。杨鹤龄在来函中以赵克国、伯夷、姜子牙等自喻，孙中山对其“存心做官”颇不以为然，认为此非其“长才”。从孙中山对杨鹤龄的三次聘用来看，可谓知人善任。